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总第30辑 Lishi WenxianYanjiu

历史文献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总第30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历史文献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文献研究. 总第 30 辑/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617-8618-5

I. ①历… II. ①中… III. ①历史—研究—中国—丛
刊 IV. ①K2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5541 号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 30 辑)

编 者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主 编 周少川
项目编辑 陈庆生
审读编辑 陈飒飒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昆山亭林彩印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0.75
字 数 393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618-5/K·348
定 价 4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辑委员会

编委	朱杰人	郝润华	曹书杰	周少川
	张涛	邓瑞全	何林夏	王记录
	李晓明	张新民	毛瑞方	陈虎

主 编 周少川

常务编委 陈虎

编委会通讯处:

邮政编码: 100875

地址: 北京师范大学校内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电话/传真: (010)58800268

网络地址: www.chla.net.cn

电子邮箱: chla2007@163.com

本刊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资助

目录

1	“云”与“致知格物”	诸祖耿 遗著
6	丹阳齐梁石刻方位问题	
	——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	施 丁
14	《朱子家礼》解读	
	——以婚礼为例	朱杰人
23	赣南风水塔与风水信仰初探	万幼楠
38	赣南客家人与中原汉人的关系刍议	杨 昶
42	从几部族谱看客家的起源	王 铁
49	客家地区碑刻研究述略	周建新
59	传统客家聚落中新老姓氏的生存竞争与调和共处	
	——以上犹县营前镇为例	罗 勇
77	“江东神”论考	
	——基于地方文献的分析	邹春生
86	试析宋代赣州铸钱题刻与宋代赣州铸钱业	刘灯明
94	宋代赣南盐子狱的地域社会背景分析	郭秋兰
102	从古地名看宋城赣州的商业文化	梁 艳
107	曾几与江西诗派	赵 敏
113	书写与流传	
	——文化史视野下的郁孤台	温春香 朱忠飞
122	《商君书·垦令》篇发微	全卫敏

133	秦平百越与五岭考论	
	——兼论揭岭及古揭阳县治的相关问题——	郭伟川
148	《谢灵运集》校正	刘立志
154	《宋太祖实录》修纂考论	孙新梅
161	《西昆酬唱集》的编定及选诗	许 琰
169	论三苏父子兄弟间的和谐亲情	赵 捷 赵英丽
176	程颢《论语》诠释的理学特色	唐明贵
184	《春秋》笔法对欧阳修史学求真的影响	邓 锐
192	国学策问与礼制更化	
	——吴师道《国学策问》研究——	邱居里
203	郑元祐《侨吴集》校勘整理札记	邓瑞全 陈 鹤
206	贝琼生平与著作考述	李 鸣
211	琉球馆：尘封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记忆	赵君尧
221	李退溪《孟子释义》之阐释特征	[韩]金真喆
232	师古在乎随时	
	——清代汉学与音乐史学思想之嬗变——	黄敏学
243	《天禄琳琅书目》对历代版本作伪的揭示	刘 蓓
254	抗战时期延安学人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洪认清
268	中国古代文献典藏价值论	王记录
281	羹汤文化文献的特点	徐兴海
289	数典纪元，观易道之纵横	
	——略论易学文化与中国古代年号——	王冉冉
297	京、索二城考	陈万卿 董恩林
304	关于影响地方文献使用价值因素的分析和思考	
	——以《滇南碑传集》为例——	田志勇 杨永平
311	回顾与思考：20 世纪的中西交通史研究	毛瑞方
322	投稿须知	

“云”与“致知格物”

诸祖耿 遗著

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将时雨，山川出云。

上面二十四字，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篇，据说是孔子弟子们记录孔子的话。

从这二十四字中，我得到了一些启示。

这二十四字的意思是说：人的气志，本质是清明的。一为嗜欲所蔽，便变得昏天黑地。像天降时雨一般，完全失去了本质的清明。仔细推寻所以变得如此极端的缘故，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出它的原因来。嗜欲的发动，开始是极端细微的，正如山川出云一般，开始不过像浮尘野马，一缕两缕；但是，到了十分猖獗的时候，便如野马般不可羁勒了。我们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登高望远，可以看见山泽之间，往往有一丝丝的游雾，在风中轻飏。因为天气晴朗，这一丝丝的游雾，不发生作用，过了一会，渐渐地消灭了。可是，假使这游雾来得浓厚的话，一刹时便可看到凝聚而为轻云，一片两片地渐渐升起，阻碍了、遮掩了整个的晴朗。由此加甚，凝合为一。到那时候，日月为之夺明，山川为之隐形，滂沱大雨，随之而下，和以前天气晴朗时的景象，完全不同了。自然界的现象如此，人们心体的现象也是如此。上面二十四字，用正喻夹写的文笔，显示了这层道理，真所谓“言虽近而旨则远矣”。

记得《淮南子》有句话，叫做：“云为胆。”往昔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后来细细观察自然界的變化，再把古人的话自己体验一番，觉得这“云为胆”三字，很有意思。我们每一件事，从不敢做到敢做，中间经过的历程，也如天气晴朗到天降时雨一样，由一丝一毫的意气发动，逐渐地磅礴充积，随后乃有断然的行动。由此一点，可以悟得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也可以悟得他所说的“集义所生”。

云为胆。

天将时雨，山川出云。

颇想借用这两句话来解释《大学》的“致知格物”。“致知格物”的解释,人言人殊,真是所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现在并不是要故意标新立异,只是想把它说得更清楚些,更近情些罢了。

我想:“致知”的“知”字,是代表人们心体之全。这心体,根本是清明的。从这清明的一点发生作用,它的力量,像神一般的灵敏、神一般的伟大。假使这清明的心体,起了一丝障翳,清明的程度,便要为之减少。障翳愈深,减少的程度亦愈高,充乎其极,变成了昏暗,与原来的状态,截然相反。所以,“知”要在于“致”。什么叫做“致”呢?“致”的意思,是发挥,是加强,是推广,是扩充。任你说扩充也好,推广也好,加强也好,发挥也好,总之,是要保持培养这心体本有的清明状态。

这种工夫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回答这问题,便是所谓“格物”了。

“物”之一字,古人解作“事”字。这个“事”字,须得把它看得广泛一些。身外一桩桩的是事,身内心理上的起灭转换,也是“事”。所以,孟子要说“必有事焉”。

“格”之一字,古人的解释很多。所以,纷纭聚讼、莫衷一是的原因,就是在这“格”字的不得定解。依我看来,“格”有“正”的意思,“格”有“排”的意思。因为“排”,所以会“正”;因为“正”,所以要“排”。排除错误,建立正确,两个意思,原是一个意思的两面。譬如画一个方格子:

	3	
2	1	4
	5	

1 是方格子的正中,可以说是一个正格。这一个正格之所以形成,全靠着两条横线、两条直线分界着 2、3、4、5。假使没有这两条横线、两条直线,这 1 的正格便不能表现出来。这四根线的排除外方,同时便是建立内方。因为这个原因,我敢说“格”是“正”和“排”两项意思的总和。其他有的人说“格”是“通”的意思,有的人说“格”是“来”的意思,解释虽不同,却都可以看作“正”和“排”另一方面的补充。譬如治河,河堤坚,河身正,河水自然通利;譬如发电,电线灵,电机开,电气自然来到了。

韩退之论作文的道理,他说:“吾又惧其杂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他虽然说的是作文,我们不妨把它借作心的动态来看。可不是嘛!一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不是思想发展的心的动态过程吗?“杂”,便是昏而不清;“拒”,便是前面所说的“排”;“察”,便是仔细考虑;“醇”便是“正”;“肆”便是“来”和“通”的意思。所以,我说:“格物”也者,是每件事——当然包括心理上的起灭转换——都给它一个正确的

安排,这正确的安排,便是心体清明的表现。事事都给予一个正确的安排,给予一个正确的分际,丝毫没有纠纷错乱的现象,这便是“格物”的工夫了。从心体上说,这种“格物”的工夫,可以叫做“致知”;从处世上说,这种“致知”的情形,也可以叫做“格物”。“格物致知”,一而二,二而一。换句话说,“格物”离不了“致知”,“致知”离不了“格物”。“格物”便是“致知”,“致知”便是“格物”。

保持心体的清明,事事给它一个正确的“恰如其位”的分际,这是“致知格物”登峰造极的工夫。做这一种工夫的人,须得常常内观,时时反省,看这清明的程度,有没有起什么变化?要不要起什么变化?变化之后,会发生什么作用?由这一点,细细拿住,便有下列的地方。用上面“云为胆”,与“山川出云”两句话的事例来省察自己,便知道古人所谓“惩忿窒欲”、“防微杜渐”、“擒贼擒王”等等的言语,都有着落了。

荀子说:“虚静而一,谓之大清明。”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箕子陈《洪范》,也说“思曰睿”,“睿作圣”。以及后人所说的“常惺惺”、“心要在腔子里”、“涵养用敬”之类,这许多话,真是举不胜举,我以为都可以借来作解释“致知格物”的帮助。为的要做好这种工夫,所以要“慎独”,所以要“心斋”,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切都要以戒律般的礼来限制自己。

“致知”便是“格物”,“格物”便是“致知”,这两者是同一件事,本无先后之分。正如光明来到,便是黑暗消灭;黑暗消灭,便是光明来到,哪有什么先后之分?非但“格物致知”应当这样看,便是“诚正修齐治平”也应当作这样看。试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呆事:要物格了,然后来致知;致知了然后来诚意;诚意了然后来正心;正心了然后来修身;修身了然后来齐家;齐家了然后来治国;治国了然后来平天下呢?《大学》所以说“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者,本末先后,在说话的次序来看,必须要有这样的排列,不是说先做了这一层然后再去做那一层啦!明显地说,我这时扫净了心体上的障翳,还复了固有的清明状态,在这刹那,就可以说物已格了,知已致了,意已诚了,心已正了,身已修了,家已齐了,国已治了,天下便已平了。多方面都停停当当,清清楚楚的了,就在这一刹那,我是成功的了。明朝人说“你当下便是圣人”,就是这个道理。反之,若是天下平了,国也治了,家也齐了;而你个人方面,心体上却堆满了各种障翳,不能回复固有的清明状态,在这时候,天下虽平,国虽治,家虽齐,你的心上,却不觉得其平其治其齐的。非但不觉得其平其治其齐,因为你丧失了清明状态,或许反要影响着、损害着其平其治其齐哩!再反之,天下本是不平,国本是不治,家本是不齐,在这时候,你的心上却恢复了固有的清明状态,一些障翳都没有,这时,因为你保持着固有的清明状态,你有一个正确

的方针,应付各方,就在这时,天下虽不平,国虽不治,家虽不齐,而在你心上,你却看得都是清清楚楚、停停当当的了,这便是家齐国治天下平。所以,古人说“起心动念,天悬地隔”,真是的的确确的话。

有人要问,照你这样说来,平天下不是太容易了吗?怕不是这样简单!我得回答他说:古人的话,本来是很简单,后来的人,把它看得过于高深,遂尔发生许多枝节。平天下本来亦很简单的,不像后来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繁杂。后来一般人都错误地认为用一种力量来加在众人头上,这才是平天下,不知道用这个办法做去,只有愈做愈糟,左亦不成,右亦不来,所以觉得繁杂。《大学》对于平天下一节,根本只提出一句“絜矩之道”,再加上一句“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而已。这“不慎”的“慎”字,就是“诚意”节“必慎其独”的“慎”字。这“必慎其独”的“慎”字,就是我上面所讲的“致知格物”的工夫。根据这点,所以我们可以说“致知格物而平天下”。

“絜矩之道”,过去的人,往往解释得过于晦涩,使人不易明白。“矩”,原来是为方之器,等于现在木工用的曲尺。“絜”,是左右量度的意思。一个正方,有四只直角,每只直角,都有九十度。我们要画一个平方,只消用曲尺放起,这边一画,那边一画,那边一画,这边一画便够了。在这平方上,把这边一只角量那边一只角,把那边一只角量这边一只角,都是相同。这便是《大学》所谓“絜矩之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别人的心,同我一样,我所喜欢,人亦喜欢;我不喜欢,人亦不喜欢。根据自己的心量度别人的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为恕”;这便是“絜矩之道”了。

试想这种道理,不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吗?大凡一种道理,愚蠢的人,往往不甚了解,这是所谓“不及”。聪明的人,往往求之太深,这便是所谓“过”。“过”与“不及”,都是不行。古人所说的道理,本是简单,本是平常,“夫妇之愚”,本可以“知”,“夫妇之不肖”,本可以“能”,本可以“行”,并不十分繁杂。《大学》说“欲明明德于天下”,后来说“天下平”,可见“平天下”就是“明明德于天下”。主要之点,在于每个人的自己。专制国家,君主的责任,较群众来得重大;民主国家,领袖的责任和群众的责任,同样地重大。假如人人化除私见,不纯粹为个人自己打算,人人以“絜矩之道”相处,不就是天下平了吗?就我个人来讲,我不是君主,也不是领袖,我独自一人立身于古往今来上下四方之中,假使我今天豁然觉悟,扫除了心体上的种种障翳,恢复了原有的清明,“独”是“慎”了,“知”是“致”了,“物”是“格”了,凭借了这点清明,以之应付万事,各方面都停停当当、清清楚楚,不就是天下平了吗?所以《论语》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往昔读黄山谷诗,到“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明清”。爱其胸次洒落,绝无一些尘滓。

又读唐人诗，爱“空山多雨雪，独立君始悟”两句，以为删除枝节，独探其源，这二语庶几近之。

现在考虑“格物致知”的真实含义，深深地感到“云为胆”和“山川出云”二语的可玩味，所以把它不惮辞费地捏出来，供给“洗心退藏于密”的朋友，共同商讨。

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是1942年在大理时写的，没有发表，也没有给人看过。后来重到昆明，重到云南大学任教，曾经给李源澄看了一遍，当时，他同意我这种看法。

现在读《管子·内业》篇，其中有这样的几句：

见利不诱，见害不惧，宽舒而仁，独乐其身。是谓云气，意行似天。

静则得之，躁则失之，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无败。节欲之道，万物不害。

这些话，和我前面所说，可以互相发明，因记之于此。

1961年8月5日 祖耿 廊后街11号

〔编者按〕 诸祖耿先生(1899—1989)，江苏无锡人，章太炎先生弟子。曾参加“章氏国学讲习会”活动，并负责记录，整理有《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等章氏演讲录。先后任教于东吴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学术领域兼涉经史、诸子，出版专著有《战国策集注汇考》、《尚书章氏学》、《先秦学术概论》、《韩柳文衡》等。本文从云的渐聚变化悟“致知格物”之理，阐发新意。经仓修良先生推荐，现按原文格式刊出，以飨读者。

丹阳齐梁石刻方位问题

——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

施 丁

〔摘 要〕 朱希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所写丹阳齐梁帝陵石刻的方位存在一些问题,兴安陵不在三城巷而在仙塘湾,修安陵不在仙塘湾而在金陈湾,庄陵不在萧塘港北而在三城巷,萧塘港北石刻乃港区或皇业寺前的标志物。

〔关键词〕 齐梁石刻 丹阳 兴安陵 修安陵 庄陵 皇业寺

丹阳齐梁石刻共 11 处、26 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一千五百多年来为世人所重视,已于 1988 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致说来,其中 7 处石刻乃帝陵之物,2 处石刻为王侯墓之物,2 处石刻为陵区之物。另有 1 处帝陵《泰安陵》石刻已被毁殆尽。

对于丹阳齐梁石刻的方位,自唐、宋以来多有记载,而且时代越后,记载越加具体,这是时代发展而研究深入之故。自清代以来多有详明的定位。乾隆十五年(1750)撰成的《丹阳县志》多有较为具体的方位。民国二十四年(1935),朱希祖、李济、董作宾、滕固、朱楔等人进行了实地调查。朱希祖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写成了《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书》。载于《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1935 年版;线装书局 2006 年影印发行)。朱楔于次年出版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中华书局 2006 年再版。以下简称《六朝陵墓图考》)。他们的成绩颇为显著,其书学术价值较高,影响也很大。至今,丹阳方志办所撰《丹阳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地图出版社 2008 年版),都基本上采用了其说法。

齐梁石刻多在丹阳经山地区。本人生于此地,对石刻有些了解;又治中国历史,对有关的地理方志书籍记载也有些了解,觉得《调查报告书》对丹阳齐梁石刻所定的方位

和命名存在一些问题,于是趁年老退休、身体粗健,乃于近年多次返乡对齐梁石刻调查了解,反复探索,有了些心得。现在提出来,谈点看法。浅陋之见,尚请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兴安陵的方位

兴安陵,是南朝齐明帝萧鸾及敬皇后刘氏合葬的陵墓。今在丹阳东北约三十四里的仙塘湾(胡桥东 1000 米,泉湾里东北约 300 米)。

《调查报告书》云:兴安陵“在今丹阳县东北二十四里尚德乡东城村”。这个定位是错误的。可是,1992 年《丹阳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基本上按照这个说法,说兴安陵“坐落在三城巷东北约 500 米处”。江苏省人民政府 1999 年所立“齐明帝萧鸾兴安陵石刻”碑就树在此地。

先来看看唐宋以来的方志关于兴安陵的记载。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 26 云:“齐明帝鸾兴安陵在县(丹阳)东北二十四里。”从此以后,南宋嘉定《镇江志》、王象之《舆地纪胜》、元至顺《镇江志》、《明一统志》等方志地理书都是如此记载。到了清代,乾隆《丹阳县志》卷 19 云:“兴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四里尚德乡。”尚德乡,就在经山地区,方圆约十余里。据光绪《丹阳县志》卷 4 记载,尚德乡有荆室、永定等等 13 里,华甸、大泊等等 13 保,东陵、泉湾、三城、东城、塘头、留墅、春圻、前艾、荆村、颜巷等等 39 村。这些村庄如今分属于丹阳市的云阳区、埤城镇、后巷镇。由此可知,《乾隆县志》所记的“尚德乡”是笼统而不具体的。《调查报告书》明定为“尚德乡东城村”,地点倒是明确了,但实际上并不确切而有了错误,其问题是:

1. 混淆了“东城村”和“三城巷”。《调查报告书》曰“东城村”,朱偁《六朝陵墓图考》曰:“由丹阳而东二十余里,至三城巷,稍北即为齐明帝兴安陵。”而其《丹阳六朝陵墓石刻》一文(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3 期)又说,“在丹阳城东略偏北 24 里尚德乡东城村,有齐明帝萧鸾的兴安陵。”他们或曰东城村,或曰三城巷,把两村混二为一了。其实,清代以来,“东城”自是东城村,“三城”自是三城巷。《光绪县志》卷 4 所载“东城、三城”等村是很清楚的。两村都在经山南向冈阜的南段,三城巷在南端,东城村在其北,两村相距约三里,并非一个村庄。

2. 所谓“尚德乡”,包括 39 个村庄,既有“三城”、“东城”,还有“泉湾”、“前艾”等等。三城巷距丹阳县城约 24 里,前艾庙在丹阳东约 28 里,泉湾里在丹阳东北约 34 里。《调查报告书》确定兴安陵在东城村或三城巷,根据不足,是欠妥的。

3. 古来方志所写兴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四里”有误。但《调查报告书》既不注意“东

北”有问题,又不知“二十四里”有错误。须知三城里山东边湾里的四处齐梁石刻,自南至北距离不足800米,都处于丹阳之东(稍微偏北)二十余里,古来称这个地区多曰“东”,而不称“东北”;若是称“东北”,则与实际及习俗之称不符。试以《乾隆县志》为例,它称景安陵(在前艾庙东北三里余)“在县东三十二里”;修陵(在三城巷东北第3处)“在县东二十五里皇业寺前”;庄陵(朱氏所言在东城村,武帝修陵北数十步)“在县东二十七里……地有港,名萧塘”;萧港(即萧塘,在三城里山的东湾)“在县东二十七里皇业寺前”;皇业寺(在东城村东北约1里)“在县东二十五里萧塘港北”。《大清一统志》也是这样记载的。由是可知,清代对三城巷至东城村这个地区的陵、寺、港多曰“县东”,而不称“县东北”。《乾隆县志》只有记建陵(在三城巷东北第2处)曰:“在县东北二十五里东城村。”这里的“东北”有问题了。参照《乾隆县志》的多处记载,这个“东北”应当改为“东”才是。

故本人以为,兴安陵的方位肯定不在三城巷或东城村的近处。

那么,兴安陵在何处呢?本人以为在泉湾(今称泉湾里)附近,即在胡桥东1000米处的仙塘湾(也称鹤仙坳)。这个地方在丹阳东北方,距县城34里。《调查报告书》认为此处是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是成问题的。

上文所引《元和郡县志》的“县东北二十四里”,应当重新审察一下。本人以为,“东北”二字没有错;“二十四里”却有点错误,“二”乃“三”之误。

《元和郡县志》本是名著,但历来传抄翻印过程中造成一些错误,如其卷26记载:“(齐)武帝跸景安陵,在县东二十二里。”《舆地纪胜》引《元和郡县志》云,“景安陵,在丹阳县东三十一里”。《嘉定镇江志》卷11则记为“(景安陵)在县东三十二里”。后两部书显然是对《元和郡县志》纠了错,把“二十二里”中的前一个“二”字改正为“三”了。不仅如此,《元和郡县志》在此书景安陵的文字之下,书“景帝道生永(按:“修”字之误)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六里”,“明帝鸾兴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四里”中的两个“二”字,也是“三”之误。乾隆、光绪两部《丹阳县志》已把修安陵的“二十六里”改为“三十六里”,这是对的。《调查报告书》也说:“案:当作‘三十六里’。”其所修改很有道理,很对。只是他们尚未将兴安陵的“二十四里”改为“三十四里”。这就是知一而不知二,明于此而忽于彼了。

只要明乎“县东北二十四里”乃“县东北三十四里”,则兴安陵必在仙塘湾而无疑。江苏省人民政府1999年把“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石刻”碑立于仙塘湾不妥,应当将树在三城巷东北约500米处的“齐明帝萧鸾兴安陵石刻”碑移置于仙塘湾,才符合历史实际。

二、修安陵的方位

修安陵,是南朝齐景帝萧道生的陵墓,今在丹阳东北 36 里的金陈湾(旧称金王陵)。

《调查报告书》云:修安陵“在今丹阳县东北三十六里鹤仙坳(在经山东南三里,烂石山陇西三里)”,这是不确切的。

上文已经指出,《元和郡县志》所书“齐景帝道生永安陵,在丹阳县东北二十六里。明帝父也,追尊为景皇帝”,有点错误,“永”字为“修”之误,“二十六里”之“二”为“三”之误。嘉定、至顺两部《镇江志》也沿袭其误。明、清之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 25 云:“明帝父道生修安陵正在金牛山下。”《乾隆县志》云:“修安陵在县东北三十六里经山。”后两部书所说的“金牛山”、“经山”,都是指经山地区,并非指有主峰的经山。后者提到“县东北三十六里”尤为重要。但“经山”云云,还稍为笼统。古时对于经山,有专称和泛称之别。专称的经山,是指其主要的山头;泛称的经山,是指经山地区,大致包括水经山及其周围 10 里的冈阜在内,狮子湾、仙塘湾、金陈湾等都在其中。《调查报告书》把修安陵指定在“鹤仙坳(即仙塘湾)”,是因对“经山”的理解范围太窄,又未思考“县东北三十六里”实际上比仙塘湾距丹阳 34 里还要远些,金陈湾距丹阳正好是 36 里。故将修安陵定位在金陈湾,实在再恰当不过。

再者,齐景帝萧道生乃“明帝父”,其修安陵处于仙塘湾兴安陵东边的金陈湾;明帝乃景帝道生之子,其兴安陵处于修安陵之西的仙塘湾,父陵在东,子陵在西,也是符合古代礼法和人情常理的。

几十年前,考古工作者曾对仙塘湾和金陈湾的两处齐陵进行了发掘。据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一文(载于《文物》1974 年第 2 期)云:“胡桥大墓位于丹阳东北 17 公里,水经山南的仙塘湾”,“从清理中发现的两个头骨碎片,可知为一合葬墓”。他们因受《乾隆县志》和朱楔《六朝陵墓图考》的影响,以为此墓“可能为南齐景帝萧道生夫妇合葬的陵墓”;不过用了“可能”二字还算是谨慎的态度。当时他们还不知此墓乃明帝萧鸾及敬皇后刘氏合葬的兴安陵。他们在发掘中,发现了由模印画砖组合的“羽人戏虎”、“竹林七贤”以及“骑马武士”、“执戟卫士”、“执伞盖侍从”、“骑马乐队”等壁画,断定为皇上的陵墓。他们又于 1968 年对金陈湾帝陵进行发掘,发现了墓室内有“羽人戏虎”、“羽人戏龙”、“竹林七贤”等等砖刻壁画。可见,二陵内部之物基本相同。此可以证明两者皆为齐陵。只是因二陵皆早已被盗,无陵内其他实物可以证明究系何帝之陵。

如今江苏省人民政府于仙塘湾石刻处立有“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石刻”碑,于金陈湾石刻处立有“南齐失名陵石刻”碑,都欠妥当。本人以为,应把前一碑移至于金陈湾,后一碑所谓“南齐失名陵石刻”则可撤去。

三、庄陵的方位

庄陵,是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及简后的陵墓。今在丹阳东二十余里三城巷东北500米处。

《调查报告书》云:庄陵“今在丹阳县东北二十五里东城村,武帝修陵北数十步”。即指东城村东南约1里、萧塘港北石刻处。这是不确切的。

还是先来看看唐宋以来地理、方志之书对庄陵是如何记载的。《元和郡县志》卷26云“梁简文帝纲庄陵,在县东二十七里。”后来的不少地理、方志书都照样如此写,如《嘉定镇江志》、《舆地纪胜》、《至顺镇江志》、《明一统志》、《读史方輿纪要》、《乾隆县志》、《大清一统志》、《光绪县志》等都记为“在县东二十七里”。这种记载是较为笼统的,且“二十七里”也有小误。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已于北宋初年对《元和郡县志》此条有重要的修正。其卷89云:“梁简文帝陵有麒麟,碑尚存,陵有港,名曰萧港,直止陵口大河,去县二十五里。”对于这条记载,可以注意几点:

1. “碑尚存”。作者知道此陵有碑,可能亲自看到了它。有碑可为考证,证据可信,定然不误。

2. “陵有港,名曰萧港,直止陵口大河”。可见庄陵在萧港之侧;而不是在萧港之北。

3. “去县二十五里”。这是对《元和郡县志》“二十七里”的修正。此处距丹阳不足27里,说“去县二十五里”较为切实。后世学者对此笔多不理解,或误以为“去县二十五里”是指陵口去丹阳的距离,有所谓“按陵口离丹阳城,土人云仅十八里,火车行十分钟即可到”云云,殊不知《太平寰宇记》是指庄陵去丹阳的里程。

后世的学者,或亲临过庄陵,或对《太平寰宇记》这条记载稍有领悟,如:南宋王象之于《舆地纪胜》卷7云:“梁建文帝庄陵,《元和郡县志》云‘在丹阳县东二十七里’。地名三城港,有石麟高丈余。”他似乎到过庄陵,虽然尚不知《太平寰宇记》已将“二十七里”改正为“二十五里”,但指出“地名三城港”是确切的,十分重要,应予以充分肯定。

《乾隆县志》记载庄陵不太明确,易被人误解。其卷19云:“庄陵在县东二十七里,梁简文帝及简后所葬。地有港,名萧塘港,前有石麟高丈余。”卷2云:“萧港在县东二十七里皇业寺前,直入陵口。”还于卷11云:“皇业寺,县东二十五里萧塘北。”可以看